

# 通过杜甫感受中华文明精神特质

## ——对话英国历史学家、制片人、作家迈克尔·伍德

◎本报记者 姜红

近日,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迈克尔·伍德之新作《中华的故事》一书在英美出版。该书采用宏大历史叙事讲述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历程,与此同时又着眼于形形色色鲜活的人物及事件,可谓宏观史与微观史的结合。

2016年,伍德制作的同名纪录片《中华的故事》在全球播出,获得广泛关注与好评。今年早些时候,伍德撰稿并主持的纪录片《杜甫: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一经播出也引起轰动,让西方观众感受到了“中国诗圣”及其作品的魅力。他关于杜甫的新书《追随杜甫的足迹》(In the Footsteps of Du Fu)预计于明年出版。

实际上,伍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对杜甫以及中华文化产生浓厚兴趣。“文明的精神特质在其诗歌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”伍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。



玛雅视觉国际/供图

迈克尔·伍德(Michael Wood),1948年生于英国,毕业于牛津大学,身兼历史学家、纪录片制片人、主持人、作家等多重身份,现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公共历史学教授,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、皇家艺术学会院士。伍德著有十多本畅销书,其关于英国历史的著作包括《追寻黑暗时代》(In Search of the Dark Ages,1981)、《追寻莎士比亚》(In Search of Shakespeare,2007)、《英格兰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England,2010)等。同时,他曾拍摄120多部纪录片,包括《追寻文明的起源》(Legacy: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,1991)、《亚历山大东征传奇》(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,1998)、《印度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India,2007)等。2016年,由伍德撰稿并主持,英国广播公司(BBC)和美国公共电视网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《中华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China)播出;2020年,由他撰稿并主持的纪录片《杜甫: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(Du Fu: China's Greatest Poet)由BBC推出。

### 与中国结缘数十年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为何要制作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并出版新书呢?

伍德:我对于中国的迷恋始于曼彻斯特的学生时代。当时,我“邂逅”了格雷厄姆(A. C. Graham,1919—1991)编写的《晚唐诗集》(Poems of the Late Tang,1965),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新世界的窗口,而这新世界是我做梦都不曾想到的。后来,我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,同屋是一位汉学家,经常把好书借给我看。我读到了诸如亚瑟·威利(Arthur Waley,1888—1966)翻译的《诗经》等书,很受启发。这段经历让我大开眼界。

读了研究生之后,我开始进军电视行业。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,最早开始在中国拍摄影片是在80年代末。

我和妻子丽贝卡在玛雅视觉国际公司工作。自此开始,我们制作了许多历史、文化和政治纪录片,这些纪录片传达到世界各地,其中有的覆盖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在我们制作的历史系列纪录片中,有2007年的《印度的故事》。此后每个人都说道:“你也要拍一个中国的!”所以说,《中华的故事》有一段酝酿的时间。

我们拍了许多历史纪录片,也拍了许多文化纪录片,其中包括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四部曲,一部关于伟大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(前43—17年)的影片,以及其他有关早期英国文化的影片。所以说,关于诗歌和文学的影片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制作《中华的故事》时,我们加入了很多文化元素,讲述中国著名作家和诗人的故事。我一直感觉文明的精神特质在其诗歌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旅行者和纪录片主持人,我在中国的旅行前后跨越了40年。我制作了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播出的纪录片《中华的故事》,然后在2018年制作了系列影片——《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China's Reform and Opening Up,5集),以纪念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决策40周年。改革开放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最近的一次,是在2019年秋天,我回国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纪录片。它给了我另一个机会来思考、回顾中国文化及其持久的理想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的新书《中华的故事》与2016年的同名纪录片相比,有何异同?

伍德:影片与书籍的功能差别很大。在600页左右的书中,可以呈现的内容要比影片多得多。在书中可以展开更为丰富的上下文论证、展现细微差异,从而扩展资料,而影片则很难在这方面做得出色。在书中,也可以在主主题思想方面下更大功夫。对于一些人物的故事,比如李清照(1084—1155)、曹雪芹(约1715—约1763)等文化名家,还有一些鲜为人知但引人入胜的女作家,例如郑允端(1327—1356)、方维仪(1585—1668)、何震(1886—?)等,影片只能浮光掠影,而书里可以有更为细致的描述。

该书还介绍了最近几年的一些新发现,例如秦汉法律文件、征战时期秦

兵的信函、丝绸之路上驿站和瞭望塔的汉代信函。人们的心声构成本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有鉴于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,您在纪录片和书中如何选材?

伍德:所有历史著作都是一种选择:这是一种选择的艺术,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,提供顺畅而有意义的叙事。对于影片而言尤为如此——影片是极为压缩的叙事。

中国历史如此浩瀚,如何选材更是至关重要:这本书将有600页左右——其书光是关于杜甫的内容就可以写这么长了。由于本书作为普通读者的入门书,旨在提供一种叙事,使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浩瀚的历史能有一定的了解——了解贯穿中国历史的重大主题、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世,因此《中华的故事》具有不可思议的戏剧创造性和人文性。一些读者对于中国可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,而我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讲述中国的历史故事。

此外,在选材方面可以遵循个人兴趣偏好。比如,我有意识地加入一些伟大女性的故事。近期我们已经有了关于慈禧的书和武则天的影片,而我更关注一些不那么出名但是有精彩著述传世的女性,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李清照、郑允端、方维仪,以及章学诚(1738—1801)所写传记中的女性,秋瑾(1875—1907)、何震等晚清的女权主义者等。我对她们的女权主义宣言很感兴趣。

### 中华核心价值观得以延续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刚刚提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,中国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文明。您认为中华文明得以长期存续的关键何在?

伍德:简而言之,就是《论语》中孔子关于“斯文”的著名论述。这个理念一直风雨无阻地伴随着中国人,即使有汉末或唐末那样的天下大乱。尽管文化和语言种类繁多,但人们相信汉文化和文明,尤其是文字及包含中华价值观的核心文本是基石。

回顾一下王仁裕(880—956)对于五代乱世的思考(我在书中也有所涉猎),或者南宋的陆游(1125—1210)对于国家分裂的扼腕,可以发现上述核心理念中国古已有之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西方一度非常仰慕中华文化,然而在18世纪之后中国却被西方赶超。您认为个中原因何在?

伍德:这说来话长,也有很多著述探讨这个问题。简而言之,从历史上讲,这是一场“完美风暴”:大西洋沿岸小型而具侵略性的海上强国崛起,推崇重商主义和个人主义。随后是欧洲对新世界

的征服,对新世界人民及其资源的掠夺;然后以煤炭为动力的工业革命使它们超越了中国的领先地位。

此外,我还要补充的是欧洲内部的军备竞赛——在17—18世纪期间战争不断——这意味着西方在军事技术上超过了中国。清朝统治者直到那时都没有真正的动力来发展军事和海军军舰技术,因为在东亚没有什么竞争对手。再加上西方用于世俗科学概念的现代性去颠覆印度、中国或者说新世界传统文明。

最后,还有一个要点是西方的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思维。而中华文明并不推崇征服本国以外的民族和人民,正如利玛窦(1552—1610)在其引人入胜的日记中所说,他们的目标是在本国境内保持其文明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?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今日之崛起?

伍德:这取决于要审视的时间范围。毕竟,东林党人在17世纪初就谈到了民族振兴,他们与后来南方的思想和文化复兴运动之间是有连续性的,例如复社运动、常州学派,以及思想现代性的贵州学者。施吉瑞(Jerry Schmidt,1946—)在其名著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》(2013)中对此有精彩阐释。费正清(John Fairbank,1907—1991)也著有《伟大的中国革命:1800—1985》(1986)。这意味着中外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长期的变化轨迹。因此,1949年的胜利虽然是40多年革命的结果,但实际上已经酝酿了400年。

关于中国崛起的因素,我首先要说这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团结、耐心、创造力、活力、勤奋努力的精神,以及他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热爱,深藏于心的正义感、公平观、平等观。

我还要说,中国梦的一个关键时刻,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人民的潜力。当然,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,而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,1977年夏到1979年春是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。我拍摄的5集影片《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》就是以此为主题。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,疲于应付社会矛盾。而邓小平在教育、农业、经济和工业等方面的决策改变了中国。为了制作上述影片,我还跟一些美国学者交流,包括傅高义(Ezra Vogel,1930—)在内。傅高义认为,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。自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源于此。不过最大的荣誉还是归于中国人民。

### 杜诗凝聚中华价值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曾提到,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杜甫所吸引。请谈

谈您制作杜甫纪录片的缘起。

伍德:自从在学生时代读到格雷厄姆的《晚唐诗集》译本,我就对杜甫产生了兴趣,从那以后就一直着迷。我们在2016—2017年度英国广播公司(BBC)系列纪录片《中华的故事》中对杜甫有所涉猎。在该系列纪录片收到热烈反响之后,我很想要将杜甫正式介绍给英国观众,同时也很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在中国放映。

中国的观众对《中华的故事》给予慷慨好评,而且我很热衷于回到中国,与我们非常喜欢的中国摄制组一起再次拍摄纪录片。在制作了关于奥维德的影片之后,我们认为讲述杜甫的故事很有意思。因缘际会之下,杜甫的纪录片由英国广播公司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。

要制作影片就要进一步挖掘杜甫的故事,我自然对此也很好奇;参观成都的杜甫草堂,到白帝城以及离长沙不远的平江县安定镇——我一个中国朋友的父母住在平江,他们向我介绍了那里清明节杜甫墓前的纪念活动。

今年秋天我还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新书,书名暂定为《追随杜甫的足迹》,作为我对于杜甫精神的敬意和献礼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请您具体谈谈这本关于杜甫的新书。

伍德:它目前还只是草稿。可以说,它是基于我的旅行而写的一本游记,同时介绍杜甫的生平和诗歌,里面还有很多我到访之处的照片,另外还有地图。这样一来,感兴趣的读者就可以“按图索骥”,把它看成实用指南。

我刚刚把它交给我的代理人,目前暂时还没有找到中国出版商。不过我希望尽快找到出版商,力争在明年年内出版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杜甫在中国被称为“诗圣”,与“诗仙”李白齐名。您为何认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呢?

伍德:中国人自然将二者相提并论。他们几乎代表着人类的两面,即太阳精神精神和酒神精神。我之所以要说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,正如我们称莎士比亚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,原因就在于杜甫的作品所涉及的范围极广。其诗作既有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,也有他在



伍德在杜甫草堂遇到了一位小杜甫。玛雅视觉国际/供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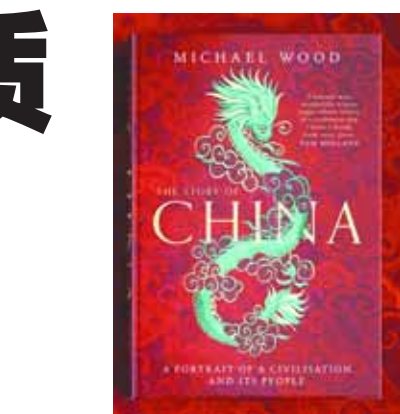
三峡对于人与自然、风景以及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,还有关于亲情、友情的亲切描述,聚餐、画棋为棋局等生活场景的再现。

杜甫广阔的想象力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。如同莎士比亚对于英语的贡献,在我们的杜甫纪录片里,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,1946—)谈到,杜甫不仅写下了“中文最伟大的词语”,而且创造了“中国文化的道德和情感词汇”。

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杜甫信奉儒家的仁义道德,这些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运行及人际交往中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。他说,这些“使社会运转”。

杜甫饱含深情地描写友谊和家庭,他笔下大量的关于宴饮的描写。对于中国人而言,与家人或友人聚餐当然是一个心头好。

尽管杜甫寂然离世,但是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他的诗歌开始为人所知,10世纪时他声名鹊起,到12世纪他已经被视为伟大的诗人。自此之后,在宋代的儒学复兴之下,杜甫以美妙的语言凝聚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观,这些价值观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

从左至右:伍德2020年11月出版的新书《中华的故事》、纪录片《杜甫: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海报



玛雅视觉国际/供图

使、汉学家都白(Nicolas Chapuis)也说过,杜甫之于中国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英国、雨果之于法国。您认为杜甫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否也在提升?

伍德:郁白翻译的杜甫全集将要以法文出版,里面还有很多有用的、细致的评论。继中文版杜甫全集、宇文所安的英文版杜甫全集之后,我们将要迎来一部精妙的法语版杜甫全集。书中评论丰富而且很有效用,不仅吸收了近20年来中国的评论,而且还吸收了近200年来西方的学术评论。

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,全球日益将杜甫视为跨越翻译边界的诗人。他的声音像莎士比亚那样广为人知,正如郁白在其书中序言所说,“直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”。

我很喜欢郁白在一个采访中对于钱锺书和《管锥编》的探讨。郁白认为,《管锥编》这一杰作发掘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。钱锺书精通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等。他的《管锥编》告诉我们,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,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完全是人为的。其实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本来理解西方哲学,也可以用西方的哲学来理解中国文本。

钱锺书关注的是,何以为人。他告诉人们,尽管有方法和观念方面的差异,但是文化是全球性的。有些被人们认为是自己国家独有的事物,其实并非本国独有,它们是全球性的,是关乎人的。正是在诗歌中可以发现人性。中国的诗歌一直都是关乎人的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认为以杜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何特殊意义?

伍德:在我们这个时代,过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我们身边退去,在现代化的中国尤其如此。但是,人们依然可以在当下的中国寻找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。因为在这表面之下,所奔流的依然是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

深深的源泉,其中诗歌就是中华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一大源泉。中国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诗歌传统。《诗经》中最古老的诗歌要早于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。今天人们依然承认,杜甫的言语从某些角度告诉我们,何为中国诗人。

但杜甫的诗作不仅仅是为中国人所写的——在我们

这个动荡的时代,这位生活在8世纪之人的思索,关于友情的主题、唐诗的世俗视野、禅宗的宇宙人文主义,即是通过翻译,也仍然具有当代意义。因此,随着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,我们今天追随杜甫当年的足迹并且了解其背后的深意,愈加凸显其重要性。

### 打动人心是制片关键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在拍摄有关杜甫的纪录片时,您循着杜甫当年的足迹深入中国各地。您是否也让您对杜甫有了更多新的认识?

伍德:在旅行中总会学到新的知识,尤其是中国的风景、人文、文化和风俗都如此丰富。当然,聚焦杜甫本身就必然可以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有更多的了解。尽管过去70年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,但中华文明持久的价值观仍然存在。

我们按计划追随杜甫当年走过的路。之前我们在玛雅视觉已经制作了很多关于文化和历史的影片,常常会在旅途点滴之中穿插历史故事,这样讲述故事的方式更有动感,当然,我们的镜头也更具动感。有一家报纸把我们一些纪录片的制作方式称为“历

史一旅行一探险”。

例如,我们制作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(前356—前323年)的系列故事,跟随他当年的足迹,从希腊到印度,经过伊朗、中亚地区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;后来又制作了关于西班牙如何征服新世界的故事,足迹遍布墨西哥、秘鲁、厄瓜多尔和亚马孙热带雨林。有些旅程非常戏剧化,甚至令人毛骨悚然。这些纪录片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尽管莎士比亚主要生活在斯特拉福德和伦敦,不像杜甫那样有很多游历,但我们在制作关于莎士比亚的纪录片时,还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丰富叙事模式。例如,为了再现16世纪90年代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,我们乘船航行到了荷兰。

杜甫的生平自然也适合以这种方式来讲述:在其后半生的数十年间,他一直在漂泊,从西安到天水,翻山越岭到达成都,然后到白帝城、荆州、洞庭湖、长沙及平江。

这种叙事方式推动着故事的展开。当然杜甫的诗歌中本来就有这种推动作用,他的旅途就如同他所写的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”。通过制作这部影片,我感到自己更加理解杜甫了——追随他的足迹,阅读他的诗作,一路上思考他的诗作,自然也就有了更多领悟。

我对影片的一些拍摄地点已经很熟悉了,比如曲阜,我第一次去那里是在20世纪80年代,后来我们又去那里拍摄《中华的故事》;西安我也去过很多次。但成都我是第一次去。在杜甫草堂跟人们聊天非常愉快,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次造访。长江三峡我也是第一次去,在白帝城的经历很精彩,即使当地风光与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。

出乎意料的是,湖南平江的乡间风光很迷人,尤其是汨罗江沿岸。平江县安定镇的杜甫墓也很壮丽庄严。读者们若去湖南,这些都值得一游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在拍摄杜甫纪录片的时候,您有哪些最难忘的时刻?

伍德:有很多难忘的时刻,这里我就简要说一些。我觉得在拍摄杜甫纪录片的时候,最感动的时刻就是在成都杜甫草堂与人们交谈之时。在我们的影片中也都采用了一些画面。我很喜欢人们对杜甫、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热情。那个朗诵《春夜喜雨》的小女孩,那几位女士……还有一位老者告诉我们,他已经多次造访杜甫草堂,至少每个月去一次。他还告诉我们,他喜欢杜甫的原因是其为穷人、为普通人代言。

在我看来,他们所有人都在强烈地表达着中华文明持久的价值观念。那天与他们站在成都的雨中对话,我很感动。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在向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。您认为您成功的关键何在?《中华的故事》和《杜甫: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为何吸引西方观众?

伍德:谢谢肯定。《中华的故事》是我们关于中国的主要作品,观众对我们讲述的故事连连称奇:“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故事。”同时,西方的观众非常喜欢影片中中国人的妙趣横生及其很强的参与感;他们见证了自我的历史。我也衷心希望这些纪录片富有吸引力,因为它们确实是用心之作。

制作纪录片看似简单,只是图像、声音、文字和音乐的结合,然而,如何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才是关键。通过出色的剪辑、配乐的使用、精挑细选的语言,可以在简单陈述事实的同时营造氛围和情感。

我们还认为纪录片应该使观众有感觉,而不是干涩地叙事。所以说电影应该具有同理心,这是一个关键词。

中国观众对我们讲到,《中华的故事》“让我们有感觉”。甚至是新华社的评论也谈到了这个方面,认为《中华的故事》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障碍,创造了莫大的感动。

我认为,能够打动人心的纪录片方有最佳效果。